

A History of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

中国物质文明史

项隆元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物质文明史 / 项隆元著.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8(2013.1 重印)
(大学生通识教育)
ISBN 978-7-308-06109-4

I. 中… II. 项… III. 物质文明—文化史—中国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7451 号

中国物质文明史

项隆元 著

责任编辑 陈丽霞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德清县第二印刷厂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433 千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2 版 2013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6109-4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前言

由于中国历史悠久而且相对连续完整,故而她的文化比其他国家更为丰富多彩。我们大致可以沿着两条线索来认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一条是历史文献记载的线索,另一条是物质文化遗存的线索。无疑,文献记载和实物遗存两条线索对于认识真实的历史与文化有着互补意义。尤其是当文献记载的历史与实物遗存所反映的历史迭接在一起时,我们就有可能进入真实的历史与文化长河之中。

当前,高校有关中国传统历史与文化的课程,偏重于文献记载的历史与文化方面,这无疑是必要的。但是,传统文化的介绍,如果缺少对实物遗存的介绍,显然是不全面的。中国物质文明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憾。它既关注历史文献的记载,更注重对实物遗存的解读。通过对中国物质文明史的研读,有助于我们更加形象、全面地认识古代社会。

虽然中国物质文明史早就受到人们的关注,但至今尚未出现一本系统的有关中国物质文明史教材。这部教材是配合中国物质文明史通识课程而编写的。全书以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发展为线索,撷取北京直立人遗址、河姆渡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安阳殷墟、先秦钱币、秦始皇陵、马王堆汉墓、四大石窟寺、宋代官窑、明清故宫等著名的文化遗产,以点带面,就中国的远古人类、史前文化、古代玉器、古代青铜器、古代钱币、古代墓葬、古代纺织与服饰、古代佛教艺术、古代陶瓷、古代建筑等独特的物质文化展开较系统的介绍和探讨,内容涉及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宗教学、艺术学、农学、钱币学、矿物学、冶金技术、纺织技术、陶瓷工艺、建筑工程等众多学科领域。每章之后附有建议阅读论著目录,以便学习者延伸阅读相关文献资料。

目 录

第一章 北京直立人遗址与人类起源的探索	(1)
第一节 北京直立人遗址的发现与意义	(1)
第二节 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	(7)
第三节 关于人类起源的探索	(19)
第二章 河姆渡遗址与中国史前农业	(34)
第一节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与意义	(34)
第二节 中国史前农业	(42)
第三节 农业起源的理论探索	(58)
第三章 良渚古玉与中国古代玉器	(66)
第一节 良渚文化与良渚玉器	(66)
第二节 中国史前玉文化	(84)
第三节 中国历代玉器	(91)
第四章 安阳殷墟与中国古代青铜器	(103)
第一节 殷墟的发现与意义	(103)
第二节 中国青铜时代的特点	(109)
第三节 中国青铜器的类别与冶铸工艺	(116)
第五章 先秦铸币与中国古代货币	(140)
第一节 先秦时期钱币	(140)
第二节 中国历代铜钱	(154)
第三节 中国古代金银货币与纸币	(163)

第六章	秦始皇陵与中国古代墓葬	(173)
第一节	秦始皇陵与秦汉墓葬制度	(173)
第二节	先秦墓葬制度	(183)
第三节	秦汉以后的墓葬制度	(190)
第七章	马王堆纺织品与中国古代服饰	(206)
第一节	马王堆汉墓与汉代纺织品	(206)
第二节	中国古代纺织技术	(212)
第三节	中国古代服饰	(222)
第八章	四大石窟与中国佛教艺术	(233)
第一节	四大佛教石窟	(233)
第二节	中国佛教艺术的类别	(245)
第三节	佛教的传入与中国佛教艺术的兴盛	(257)
2	第九章 宋代官窑与中国古代陶瓷	(267)
第一节	关于宋代官窑的探索	(267)
第二节	陶器的产生与瓷器的发明	(276)
第三节	瓷业高峰与彩瓷的发展	(287)
第十章	明清紫禁城与中国古代建筑	(309)
第一节	明清紫禁城	(309)
第二节	一气呵成的中国古代建筑	(315)
第三节	中国古建筑的主要特征	(335)
	参考文献	(353)
	后 记	(358)

第一章 北京直立人遗址与人类起源的探索

人类从哪里来?人类历史有多长?地球上所有生物中,只有人类才会探究自身的起源问题。在史前时代,丰富多彩的史前神话已反映出先民确定自己在自然界中位置的强烈愿望。进入文明时代,东西方哲人都力图从理性出发合理地说明人类的起源与发展问题。19世纪以后,随着近代学科体系的确立与完善,人类对于自身起源与发展的认识才渐趋明朗。但是,人类的直接祖先是谁?人类是怎样进化的?创造过辉煌文明的中国人又是如何起源的?远古时期人类在中国大地留下过哪些文化遗存?这些仍是正在探索的问题。带着这些疑问,走进本章,看看人类学和考古学是如何试图解开这些谜团的。

第一节 北京直立人遗址的发现与意义

从1856年在德国发现尼安德特人化石到今天,人类的起源与进化问题一直是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的热点。经过人类学、考古学以及地质学、生物学等诸多学科的共同探索,学术界不仅已把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确定下来^①,而且对人类起源与进化的三个关键性的阶段,即人科的出现与繁衍、人属的诞生与进化、现代人的起源与种族的形成,有了框架性的认识。在这一探索过程中,以北京直立人遗址为代表的一批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为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一、北京直立人遗址的发现

北京西南房山区周口店镇有一座小山,小山南北长约220米,东西宽约190米,海拔高约145米。先前人们经常在山上的石灰岩洞穴或山岩裂隙中拣寻动物化石卖给中药店,这些化石当时被称为“龙骨”,小山因而得名“龙骨山”。北京直立人化石及其众多的遗物、遗迹就发现于龙骨山的洞穴堆积中。

1918年,时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安特生,赴北京西南约50公里的周口店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在龙骨山南3公里处的鸡骨山

^① 现代人类在自然界中处于:动物界(*Animalia*)——脊索动物门(*Chordata*)——脊椎动物亚门(*Vertebrata*)——哺乳动物纲(*Mammalia*)——灵长目(*Primates*)——人猿超科(*Hominoidea*)——人科(*Hominidae*)——人属(*Homo*)——智人种(*Homo sapiens*)——晚期智人亚种(*Homo sapiens sapiens*)。

发现一处含动物化石的裂隙堆积(1929年编为周口店第6地点)。这一发现,掀开了此后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在周口店地区持续多年的调查、发掘古人类化石与文化遗存的帷幕。

多年来的调查、发掘表明,周口店地区的哺乳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极为丰富,目前已发现27个化石地点,其中包括著名的周口店第1地点(北京直立人遗址)、周口店第26地点(山顶洞人遗址)等古人类文化遗址。

周口店第1地点,也称猿人洞,位于龙骨山北坡,是1921年安特生再次来到周口店时,与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人一起发现并首先试掘的。猿人洞原是一个天然的石灰岩溶洞,东西长约140米,南北最宽约40米,西部最窄处约2米,高度约40米。该洞穴早已坍塌。1921、1923年两次试掘,发掘出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其中包括2枚古人类牙齿化石。这一发现引起各界的重视。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1927年起,对猿人洞进行了系统考古发掘,当年又发现1枚古人类牙齿化石。所发现的牙齿化石经时任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主任的加拿大籍解剖学家步达生的鉴定,定名为 *Sinanthropus pekinensis*,即“北京中国猿人”^①。但这一发现与命名在当时非但未引起国际学术界的赞许,反而引来了不少质疑。确实,用如此少的材料得出重大的结论是一种大胆的做法。

2

此后近两年时间里,发掘现场一度寂静,打破这一寂静的是刚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不久的年轻助手裴文中。1929年,当主持发掘的学者已纷纷离去,仍坚守在考古现场的裴文中担当起了主持者与发掘者的重任。该年12月2日,裴文中给世人带来了惊人的发现,在主洞偏北的小洞穴中发现了第一个北京直立人头盖骨化石。这次发掘一直延续至1937年,期间仍不断有惊人的发现。如1936年底,当时主持发掘的贾兰坡在短短的11天内连续发现了3个北京直立人头盖骨化石。可惜这些化石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不知去向,至今下落不明。好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仍有一些发现,些许弥补了这一缺憾。如1966年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此发现了直立人额骨1片、右顶骨1片和右下第一前臼齿1枚。

迄今为止,北京直立人遗址共发现属于40多个个体的直立人化石200余件,石、骨、角等制品超过10万件,其数量之多为同时代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所罕见。

之所以能在一个遗址中发现如此之多的古人类化石与文化遗存,这与北京直立人长期在此活动相关联。北京直立人遗址的堆积物总厚度超过40米,上部的34米为富含化石、文化遗物与遗迹的堆积。这些夹杂着丰富化石、文化遗物与遗

^① 现已改称为 *Homo erectus pekinensis*,即“北京直立人”,俗称“北京人”。

迹的堆积依岩性变化自上而下可分为13层^①,它们主要由洞内崩坍的石灰岩碎块和流水带入洞内的黏土、粉砂等残积物构成。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对这些文化层进行了细致的发掘与清理,从中发现了众多的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

从上下13层堆积形成年代看,大致可分为上部堆积、中部堆积、下部堆积三大部分。

第1~3层为上部堆积。此3层均含化石,地质年代属中更新世晚期。与其时代大体相当的,有周口店第15地点、第4地点和第3地点。其中周口店第15地点出土的材料最丰富,有大量动物化石和石制品,还有灰烬和烧骨。在第4地点曾发现1枚人牙化石。

第4~10层为中部堆积。此7层是北京直立人遗址的主体,地质年代属中更新世中期。历年所发现的北京直立人化石、动物化石、文化遗物大部分出自这组地层中。在这组地层中还发现了用火遗迹,其中第4层的灰烬最厚处超过6米。

第11~13层为下部堆积。此3层为北京直立人遗址的最早堆积,地质年代属中更新世早期。从第13层出土的几件石器看,表明此时已有人类活动。该组地层的时代与周口店第13地点相当。后者亦为洞穴堆积,发现有石制品、灰烬、烧骨和哺乳动物化石,是周口店一带最早的文化遗存。

据铀系法断代、裂变径迹法断代及古地磁法断代,北京直立人遗址的年代为距今约70万至20万年。其中早期距今约70万至40万年,中期距今约40万至30万年,晚期距今约30万至20万年。^②

二、北京直立人及其文化

如果从1929年发现北京直立人第一个头盖骨化石算起,北京直立人的发现与研究已走过了80年的历程。通过对出土化石、文化遗物与遗迹的深入研究,人们对北京直立人的体质特征和文化特征有了较明确的认识。

1. 北京直立人的体质特征

在周口店第1地点,先后发现头盖骨6具、头骨碎片12件、下颌骨15件、牙齿157枚、股骨7件、胫骨1件、肱骨3件、锁骨和月骨各1件。这些化石标本分属40多个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的直立人个体。

北京直立人头骨仍带有较多的原始特征。其脑量较小,平均脑量约1043毫升,比现代人脑量小得多,但超过猿类^③;头骨高度远比现代人低矮,前额也较低

^① 1983年又从第13层向下发掘,挖掘了4个层次,即第14~17层,但都未发现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

^② 贾兰坡:《北京人》,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37—39页。

^③ 现代人平均脑量约为1400毫升。猿类的最大脑量为600多毫升,平均脑量约为415毫升。

平;头骨上窄下宽,最宽处在耳孔稍上方,剖面呈抛物线形;头盖骨的骨壁较厚,平均厚度约为9.3毫米,比现代人厚近1倍^①;眉嵴粗壮,向前突出,左右互相连接;颅顶正中有明显的矢状嵴,头骨后部有发达的枕骨圆枕;面部较短,吻部前伸,没有下颏。牙齿的齿冠及齿根比猿类弱小,齿冠的纹理也简单,但比现代人粗大、复杂。

北京直立人的下肢骨髓腔较小,管壁较厚^②,但在尺寸、形状、比例和肌肉附着点方面都已和现代人相似,这表明他们已经善于直立行走。上肢同样骨髓腔较小、管壁较厚,但与现代人的接近程度比下肢骨更高,说明北京直立人的上肢已能进行与现代人十分相似的活动。北京直立人的身高,从发现的一条长度为40厘米的成人股骨推算,约为1.56~1.57米。

4 从体质形态看,北京直立人各部分骨骼的发展呈现明显的不平衡性。其突出的表现是肢骨与现代人的差别较小,而头骨则带有更多、更明显的原始性质。这种现象在其他直立人化石上也有体现,如1994年开始在肯尼亚特卡纳湖西岸的纳里奥托姆发现的直立人化石便是如此。该地发现的化石是一具近乎完整的直立人骨架,包括较完整的头骨和头后骨骼中的肋骨、脊椎骨和上下肢骨等70多件标本。这具男性化石鉴定为9岁,其地质年代为距今153万年前。头后骨骼表明他能两足跨步行走,与现代人非常相似。而头骨则具有很多像猿的性状,脑量为880毫升,成年时估计为909毫升,比现代人的小得多。直立人以前的能人,比能人更早的各类南方古猿也都有类似的体质形态,那就是原始的像猿的头部结合着像现代人的身体。这表明,在人类的起源与进化过程中,由较为原始的头骨与较为进步的肢骨结合在一起的体质形态,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特征。那么,如何解释这种不相称的现象呢?

法国人类学家布勒曾对北京直立人化石所反映出的不平衡现象进行了解释,认为北京直立人遗址有两种人同时存在,一种是以头骨为代表的原始性人,他们脑量小,其智力低下,不可能达到制作石器和用火的地步;另一种是以肢骨为代表的进步性人,北京直立人文化便是这一种人创造的。在洞穴中找到的那些头骨,应是进步性人类猎取原始性人类而留下的。显然,布勒的“两种人”的说法,只是一种臆测而已,因为在北京直立人遗址中从未找到过与之相应的“原始性人的肢骨”和“进步性人的头骨”的证据。

1954年,英国生物学家皮尔在《始祖鸟与进化》一文中提出的“镶嵌进化”理论,为动物进化中存在的体态不平衡现象作出了较好的解释。他认为一个动物门类进化到另一个动物门类时,动物体的某些部分显示出明显的进步性质,另一些部分则仍然保留古老的性质,因而整个动物体好像是由进步性质的部分和古老性质

① 现代人头骨平均厚度约为5.2毫米。

② 北京直立人股骨的髓腔只占骨干最小直径的三分之一,现代人则占二分之一;胫骨的髓腔更小。

的部分镶嵌而成。始祖鸟就是生物学上最著名的镶嵌进化模式的代表,它既具有新生鸟类的特征,如羽毛和翅膀,又具有其祖先爬行类的特征,如牙齿、多节尾椎骨,翅上还有3个分明的爪。其他过渡性种类如总鳍鱼、鱼石螈等的身体结构也具有同样的镶嵌式进化的现象。古人类学家也认为,人类的进化也是一种镶嵌式的进化。^①

那么,在人类进化中为什么肢体进化快于头骨的进化?或者说,身体的哪一部分首先开始进化呢?根据镶嵌进化理论,两栖类、爬行类、鸟类等生物的起源与进化,首先要解决的是行动方式的适应问题。如从鱼类进化到两栖类,首要的问题是怎样从水中生活过渡到部分地陆地生活;从两栖类进化到爬行类,首要问题是怎样从部分地陆地生活过渡到全部陆地生活;从爬行类进化到鸟类,首要问题则是怎样从陆地生活过渡到空中生活。由于生活环境的极大差异,最先发生适应的是行动器官。作为人类行动器官的手、脚,它的分化远早于其他部分的发达。手是劳动的器官,上肢在劳动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因而最早向现代人的方向演化,速度也最快。由于手的使用,使手脚发生了分化;手脚分工后,下肢起着支持身体、走路和负重的作用,所以,下肢的进化也较快。脑及保护脑的头骨,是因手的劳动、手脚分化而随之发展起来的。因而,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四肢比头骨较早达到现代人的状态。可见,人类体质发展不平衡性是镶嵌式进化的一种正常表现,这也有力地证明了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了人类”论断的正确性。

2. 北京直立人的文化特征

北京直立人的文化遗物与遗迹极为丰富,但与其他同时期的文化遗址一样,类别较为单一,主要包括石制品、骨角器和用火遗迹。

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石核石器较少。原料有来自洞外河滩的脉石英、砂岩、石英岩、燧石等砾石,也有从几公里以外的花岗岩山坡上找来的水晶,其中以脉石英为最多。根据石料的不同,分别采用直接打击法、碰砧法和砸击法来打制石片。其中,用砸击法产生的两极石核和两极石片,在全部石制品中占有很大比重,并构成北京直立人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第二步加工多用石锤直接打击,以一面打制为主,并且绝大多数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

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雕刻器、尖状器、石锤和石砧等多种类型。砍砸器的原料多为扁圆的砂岩或石英砾石,从一面或两面打出刃口而成。刮削器系用大小不同的石片加工而成,有盘状、直刃、凸刃、凹刃、多边刃等形状,是石器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尖状器和雕刻器数量不多,但制作比较精致,有的只有一节手指那么大小,制作程序和打制方法比较固定,反映出一定的技术水平。石锤和石砧是制作石器的工具。

^① 吴汝康:《对人类进化全过程的思索》,《人类学学报》1995年第4期。

以小型石器为主要成分的北京直立人石器,是华北旧石器时代两大文化传统之一的“周口店第1地点——峙峪系”的一个重要源头。^①这个文化传统自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后曾向中国的东北、西南等地区传播。

洞穴堆积中,有许多破碎的兽骨,其中以鹿类骨骼为多。在破碎的骨骼中有一部分是人工劈裂的,打击痕迹十分清晰,这可能是北京直立人利用动物骨骼制造工具所留遗物。例如,截断的鹿角根既粗壮又坚实,可以当锤子使用;截断的鹿角尖可以作挖掘工具。但这只是一种推测,因为不能排除原始人为了食取骨髓而砸碎动物骨骼的可能性。

洞穴堆积的灰烬层中,发现许多被烧过的石头、骨头和朴树籽,还有一块紫荆木炭。灰烬有的成堆。这些现象虽然还无法证明北京直立人已能人工取火,但他们显然已用火,且有了控制火、管理火的方法。

北京直立人住地的北面是重叠的高山,西面和西南为低缓的群山所环绕,东南方是广阔的平原,在龙骨山的东边有一条河流。他们过着穴居的生活,从事着狩猎、采集等活动。成堆的灰烬及在灰烬中发现的被敲破的烧骨,表明他们已经用火取暖除湿,并知道熟食。但北京直立人的生活条件和抵御环境变化的能力仍然十分低下,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猛兽侵袭、疾病困扰,无一不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威胁。从化石测知的数十个北京直立人个体的年龄告诉我们,他们的平均寿命很短,有近70%在14岁前就夭亡了。

6

三、北京直立人遗址的价值与意义

包括达尔文在内的早期科学家在运用进化论阐述人类的起源时,其所倚重的证据主要得自于比较解剖学和胚胎学的成果。为使理论更具说服力,人们还需要寻找直接的证据——远古人类留下的骸骨化石和文化遗存。

北京直立人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为“从猿到人”的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它的发现,解决了19世纪爪哇直立人发现以来围绕科学界近半个世纪的“直立人”究竟是猿还是人的争论;使人们认识到,在人类历史的黎明时代,从体质形态、文化性质到社会组织,的确有过“直立人”阶段。直立人是古猿的后代,也是现代人的祖先,是“从猿到人”进化序列的中间环节。到目前为止,直立人的典型形态仍然是以北京直立人为主要样本。

北京直立人遗址的发现,为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文化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证据。北京直立人遗址发现的石制工具及用火遗迹表明,处于“从猿到人”中间环节的这一原始人类,他们不仅已懂得选取岩石、制作石器,用它作为工具或武器,而且已懂得使用火、支配火,掌握了保存火种的方法。工具制造与火的使用,既是人类与动

^① 贾兰坡等:《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物界最终揖别的重要标志,也是旧石器时代文化的昌盛,并由此向新的文化时代发展的主要动力。

北京直立人遗址的发现,为研究北京地区乃至华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提供依据。北京直立人遗址中发现的动物化石众多,其中既有狼獾、洞熊、扁角大角鹿、披毛犀等喜冷动物化石,也有竹鼠、硕猕猴、德氏水牛、无颈鬃豪猪等喜暖动物化石;既有安氏鸵鸟、巨副驼等耐旱动物化石,也有水獭、居氏巨河狸等水栖动物化石。而且这些化石的出土层位有一定的规律性,如早期的地层中以喜冷动物化石为多,晚期的地层中喜暖动物化石占优势。这说明在北京直立人生活时期,气候曾出现过温暖湿润与寒冷干燥的交替,与之相应的生态也发生过多次变化。

可以说,北京直立人遗址是人类远古文化的宝库,它以其丰富的发现和久远的年代,为人类起源和旧石时代文化研究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证据。因此它的发掘与研究,被看成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重大事件之一,也是世界古人类研究史上的里程碑。

第二节 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

虽然北京直立人遗址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为人们了解中国远古时期的人类状况提供了难得的案例,但它毕竟只是中国已发现的众多旧石器文化遗址中的一个,无法涵盖近200万年的中国古人类发展史。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已发现的其他古人类文化遗存作一番介绍与分析,以便对中国远古文化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起步较迟,但发展迅速。从1920年法国神父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城北发现人工打击的石核和石片之后的不到90年时间里,中国学者已经陆续在北起黑龙江畔,南到云贵高原和两广,西起青藏高原,东抵黄海和东海之滨的广泛区域中,发现了时间早晚不一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或地点超过1000处。除北京直立人遗址外,著名的文化遗址还有西侯度遗址、元谋直立人遗址、蓝田直立人遗址、金牛山人遗址、大荔人遗址、丁村文化遗址、峙峪文化遗址、山顶洞人遗址以及新近发现的许昌人遗址等。这些发现,已大致构建起从直立人、早期智人到晚期智人的中国古人类文化发展脉络。

一、旧石器时代的生态环境

环境因素是影响人类文化面貌和发展速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远古时期更是如此。自人类诞生后的几百万年的时期里,地球的环境发生过几次大的变化,它给尚处于原始时期的人类生存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人类就是在不断适应变化着的环境中,逐步与古猿揖别,并进化到现代人。

地质史上的更新世,距今约为 300 万至 1 万年,大致和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相当。根据动物群的性质、堆积物的特点和其他环境变化因素,人们把更新世划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其中早更新世距今约 300 万至 100 万年,中更新世距今约 100 万至 10 万年,晚更新世距今约 10 万至 1 万年。

在更新世,地球气候发生过几次大的波动。北半球的高、中纬度地区以及低纬度地区的一些高山,出现过几次大规模的冰川活动。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地区及西北欧,曾经历了五个冰期和四个间冰期;中国地质学家李四光根据庐山的冰碛物和冰蚀地貌,也曾划分出鄱阳、大姑、庐山三个冰期。可见,更新世的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冰川的进退,反映了寒冷的冰期和温暖的间冰期的多次交替,也导致了海平面的大幅度升降、气候带的转移和动植物的迁徙或绝灭。在这几次大规模的气候波动中,中国的许多地区仍在较长的时段内适合古人类的活动,故在更新世的大部时间里,人类活动基本没有停歇过。

中国的更新世地层保存和出露状况较好。在华北,除洞穴堆积外,更新世各个时期都有发育良好的河流或河湖相堆积,还有分布广、厚度大、连续时间长的黄土堆积。在华南,则以广泛分布于石灰岩地区的洞穴堆积为特色。这些地层中所保存的古人类化石、文化遗产和哺乳动物化石不仅为建立中国旧石器文化序列创造了条件,也为我们探索和研究古人类的生存环境提供了丰富的证据。

8

相比较而言,华北地区的更新世地层最为清楚。从地层堆积和动物群看,华北更新世可以分为四个时期:泥河湾期、公王岭期、周口店期、马兰黄土期。泥河湾期相当于早更新世,公王岭期和周口店期分别相当于中更新世的早期和晚期,马兰黄土期相当于晚更新世。

泥河湾期的地层以由砾石、砂、泥灰岩及黏土构成的河湖相堆积为特征。其动物群主要由长鼻三趾马、板齿犀、后裂爪兽等典型的第三纪末期的残余种属和象、马、骆驼、野牛、羊等近代哺乳动物组成。这些动物种类有不少属北方型,反映一种较为凉爽的疏林草原环境。泥河湾期地层的分布,除山西、河北两省北部的泥河湾盆地外,在黄河中游的汾渭流域等地也有出露。山西芮城的西侯度遗址、河北阳原的小长梁和东谷坨遗址等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就发现于这个时期的地层中。从其埋藏环境看,当时人类主要是沿着湖滨、河岸活动的。

公王岭期地层以夹有古土壤的厚层原生黄土(也称“午城黄土”)为代表,标准地点在陕西蓝田公王岭。其动物群由近 40 种动物组成,其中包括一些第三纪的残余种属,如巨剑齿虎、奈王爪兽等,但以更新世的种属为主。不过,动物群中的现生种属仅占整个动物群的 13%。动物群中带有南方色彩的大熊猫、东方剑齿象、巨貘、中国貘、中国爪兽、毛冠鹿、苏门羚等动物存在,表明当时华北的气候比较温暖、湿润,具有亚热带气候的特点。此时的环境非常适合原始人类的活动,蓝田、匭河等古人类文化遗址就发现于这一时期的地层中。从埋藏环境看,当时人们似乎更

多地活动于河谷地带。

周口店期的标准地点就是北京直立人遗址,属洞穴堆积。这时黄土堆积在华北广泛形成,称为“红色土”或“离石黄土”。周口店动物群由三个大类近 100 种动物组成。第一类是泥河湾期残留的种属,如剑齿虎、居氏大河狸、三门马等;第二类是中更新世种属,如纳玛象、披毛犀、肿骨大角鹿、中国缟鬣狗、洞熊、杨氏虎等;第三类是最早出现的现代哺乳动物种,如狼、棕熊、啮齿动物等。从生态上看,这个动物群所反映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比较复杂,但大部分属于温带古北界的种类,表明当时周口店一带的气候总的来说属温带,只是其间冷暖、干湿的波动较大,并呈现向大陆性气候发展的趋向。

马兰黄土期地层以分布极广的晚更新世马兰黄土和河流或河湖相堆积为代表。其典型动物群是产自鄂尔多斯高原东南角的河湖相堆积层中的“萨拉乌苏动物群”。这一动物群的主要成员有纳玛象、野驴、普氏野马、披毛犀、诺氏驼、马鹿、河套大角鹿、王氏水牛、原始牛、最后斑鬣狗等,大多是适应草原生活的动物。从动物群的总特征来看,华北在马兰黄土期的气候要比前一时期寒冷、干燥。

东北地区的更新世早、中期气候和华北差别不大,但从更新世晚期起差别则变得越来越明显。更新世晚期生活在东北的是“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与西伯利亚动物群大体相同,有些种属在欧洲也有分布。这一动物群的主要成员除猛犸象、披毛犀外,还有狼、洞熊、马鹿、大角鹿、野牛、原始牛等动物。其中猛犸象、东北野牛为萨拉乌苏动物群所不见,森林动物所占比重也大于华北的动物群。这些迹象表明,更新世晚期东北的气候总的说来是比较寒冷和潮湿的。

长江以南地区或许是因为所处的纬度较低,更新世的气候变化不如北方显著。分布很广的在石灰岩洞穴或裂隙堆积中发现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从早更新世一直延续到晚更新世。不过,在华南河湖相堆积中也存在可以区分为早更新世和晚更新世的哺乳动物群,如早更新世的云南元谋动物群,晚更新世的四川资阳动物群。元谋动物群反映一种比较凉爽的疏林草原环境,而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反映的是温暖湿润的山林环境。资阳动物群构成较为复杂,除含有犀牛、水鹿和剑齿象等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成分外,还包括一般只生活在高寒地区的猛犸象等。

在更新世冰期和间冰期气候的交替影响下,植被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由于华北位于寒温带区域与亚热带区域的过渡地带,所以受冰期、间冰期气候交替变化的影响尤其强烈。据孢粉分析结果,从早更新世到晚更新世,华北地区至少可以划分出 5 个冷期和 4 个暖期。在冷期,年平均气温比现今低 $4\sim 7.5^{\circ}\text{C}$ 或更多,一些诸如云杉、冷杉林或云杉、冷杉、松林等暗针叶林发育良好,并有从高山向河谷和平原、从北部向南部蔓延的趋向。在冷期的极盛阶段,则代之以适应干冷气候的草原性植被。在暖期,年平均气温比现今要高些,此时盛行的是针叶阔叶混交林或阔

叶林。

各个阶段气候的波动确实很大,但当时的人类基本能适应这些变化,或者说这种变化没有超出人类能承受的程度。如公王岭的蓝田直立人生活在暖期里,许家窑人则生活在冷期里,北京直立人的时代延续达 50 万年,其间更是经历了多次冷暖及干湿交替变化的考验。

受冰川作用引起的海平面升降以及新构造运动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东部进入第四纪后曾发生过多 次海侵和海退现象。在晚更新世低海面时期,海平面要比现今低 130 多米,因此哺乳动物和人类可以从东亚大陆分别通过几条路线向沿海岛屿和美洲迁徙。但随着全新世的到来,气候变暖,海平面回升,一些陆地又重新被海水所淹没,东亚大陆与沿海岛屿、美洲大陆之间联系受到阻隔。

二、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文化的初级阶段,是使用打制石器进行采集、狩猎、渔捞等活动的阶段。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大约从距今 200 万年开始,到距今 1 万多年前结束,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不同阶段的文化面貌有所不同,其总体的趋向是人类体质与文化同步演进。依据石器制作技术的进步和人类体质的演进,旧石器时代可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发展阶段,或进一步细分为初期、早期、中期、晚期四个发展阶段。在此我们采用四阶段划分法。

10

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分期表

旧石器时代分期		距今时间(万年) ^①	相当于人类发展阶段	相当于更新世各期		
旧石器时代	晚期	5 万至 1.2 万年	晚期智人	更新世	晚期	后段
	中期	20 万至 5 万年	早期智人			前段
	早期	100 万至 20 万年	晚期直立人		中期	
	初期	200 万至 100 万年	早期直立人		早期	

1.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

旧石器时代初期距今约 200 万至 100 万年,相当于地质年代的早更新世的后半段。此时的人类,刚从其祖先——古猿中分离出来,还保留有较多猿的性状,脑量只有 700 毫升左右,属早期直立人(早期猿人)阶段的人类。这一时期的人类,已能用直接打击法制作原始、简单、粗糙的石器;从事采集、狩猎等经济活动。尚未发现可靠的用火证据。

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遗址已发现数处,其中年代最早的是龙骨坡遗址。龙

① 旧石器时代各期与更新世各期时间不完全一致。

骨坡遗址位于重庆巫山庙宇镇龙坪村龙骨坡,在此发现了1枚古人类门齿、1段带犬齿的下颌骨化石以及众多的动物化石。该遗址属洞穴堆积,其地质年代为更新世早期,据古地磁法测定年代为200万年左右。其文化性质与内涵的确定尚待进一步发掘与研究。古人类学家吴新智认为,龙骨坡发现的似人化石属于猿类。^①

(1) 西侯度文化遗存

西侯度遗址位于山西芮城西侯度村,文化遗存埋藏在河湖相砂砾薄层和交错砂层中。1961和1962年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一批石制品、有切割痕迹的鹿角、烧骨和大量动物化石。

石制品共32件,原料主要为各色石英岩,另有少量的脉石英和火山岩。石制品的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打制方法有锤击法、砸击法和碰砧法,石器种类大致分为砍砸器、刮削器和三棱大尖状器等。这些石器大多为石片加工而成,且以单面加工者为主。与石器共存的一些遗物中有带切割或刮削痕迹的鹿角,也有烧过的动物骨骼、角和牙齿,许多动物的头骨被砸碎。

共存的动物化石种类颇多,有河狸、鬣狗、鸵鸟、剑齿象、平额象、纳玛象、李氏野猪、双叉麋鹿、晋南麋鹿、山西轴鹿、山西披毛犀、古板齿犀、三门马、三趾马、古中国野牛、粗壮丽牛、步氏羚羊、步氏鹿等。其中绝属动物占47%,绝种动物占100%。据动物群判断,其地质年代属早更新世,经古地磁法测定,年代不晚于距今180万年。

(2) 元谋直立人及其文化

元谋直立人遗址是1965年在云南元谋上那蚌村西北小山丘的褐色黏土层中发现的。这里出土了2枚人牙化石和一些石制品、带有人工痕迹的动物骨片、烧骨以及大量动物化石。

2枚牙齿化石属同一个体的上中门齿,石化程度高,并呈现浅灰白色。其形体粗壮硕大,磨蚀程度不高,切缘刚露出齿质,可能属于青年男性个体。牙齿的特征是齿冠基部肿厚,底结节发达,呈圆丘状隆起,有发达的指状突,舌面有铲形舌窝。其形态同北京直立人较接近,但似乎又更原始些,被命名为元谋直立人(*Homo erectus yuanmounesis*)。

石制品主要为石英岩打制的刮削器,也有尖状器和石片。它主要用锤击法制成,加工粗糙。遗址中发现有许多哺乳动物肢骨碎片,有的碎片上有明显的人工切割痕迹。伴随这些骨片出土的还有一些烧骨和大量炭屑。

共存的哺乳动物化石有爪蹄兽、剑齿虎、柱角鹿、元谋狼、云南马、中国犀牛等数十种,其中以食草类动物为主。这些动物包含大量华北上新世和早更新世泥河

^① 吴新智:《巫山龙骨坡似人下颌属于猿类》,《人类学学报》2000年第1期。

湾动物群成员,缺少华南洞穴堆积中常见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中的典型动物。据动物性质判断,元谋人遗址地质年代应属早更新世,古地磁法测定年代为距今约 170 万年。

(3) 小长梁和东谷坨文化遗存

小长梁遗址是 1978 年在河北阳原官亭村之北小长梁发现的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东谷坨遗址距小长梁不远。

两个遗址的石器出土于泥河湾地层中。原料以燧石为主,也有脉石英、石英岩和水晶。制法有锤击法和砸击法,不少石片未经加工即直接使用,上面有清晰的使用痕迹。石器种类复杂,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等多种。总体特征是器型较小。因此有学者认为,东谷坨石器为研究华北小石器文化脉络及探索细石器传统渊源提供了重要线索。^①

伴生的动物有三门马、三趾马、披毛犀、古菱齿象、羚羊等。据古地磁法测定,其年代距今 100 万年左右,处于早更新世与中更新世的交接点上。

2. 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 100 万至 20 万年,相当于地质年代的更新世中期的大部分时间。这一时期的人类体质有了一定的进步,以北京直立人为代表的古人类,脑量有所增加,但仍保留有较多原始性,属晚期直立人(晚期猿人)阶段的人类。石器的制作仍较粗糙,但类型增多。此时的人类仍从事采集、狩猎等经济活动。已经有了可靠的用火证据。

与旧石器时代初期相比,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址与化石地点不仅在数量上显著增加,而且其分布范围也明显扩大。除北京直立人遗址外,该时期的文化遗址和地点在河北、河南、辽宁、山西、陕西、山东、湖北、重庆、贵州、云南、安徽、江苏等省市均有发现。

(1) 蓝田直立人及其文化

蓝田直立人遗址是 1963 和 1964 年分别在陕西蓝田的陈家窝和公王岭发现的。其中公王岭发现了 1 个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和 3 枚牙齿化石,还有石器和动物化石;陈家窝发现了 1 块比较完整的下颌骨化石。

公王岭的头骨大约属于一位 30 岁左右的女性。其特征是头骨骨壁极厚,额部明显后斜,前额低平,没有额窦,眶上圆孔硕大粗壮,在眼眶上方几乎形成一条横行的骨嵴。圆枕两侧向外延展,向后明显缩窄。头骨高度较小,脑容量约为 780 毫升,小于北京直立人的 915~1 255 毫升,接近爪哇直立人的 750~975 毫升的下限。陈家窝的下颌骨化石大概属于一位老年女性,其性状也比北京直立人原始。由于两者的主要特征所显示的阶段性相似,故定为同一类型,称为蓝田直立人

^① 侯亚梅:《“东谷坨石核”类型的命名与初步研究》,《人类学报》2003 年第 4 期。